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现代性价值的 近代追索

——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

胡 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现代性价值的 近代追索

——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

胡 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
胡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ISBN 978-7-208-08124-6

I. 现... II. 胡...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504 号

责任编辑 张玲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

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

——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

胡建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5 字数 346,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124-6/D · 1435

定价 32.00 元

序 一

吴晓明

胡建教授的《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一书终于要出版了，我作为他当年的博士生导师，和他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中不乏这方面的研究者。但在这种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障碍则是局限于主观思想的“反思哲学”。黑格尔曾指出，“反思哲学”本质上乃是抽象的外部反思，它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有可能停顿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所以它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到并揭示社会的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正因为如此，这种“抽象的外部反思”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在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中，黑格尔要求使思想完全进入到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这就意味着，思想必得深入于作为事物之实质的内容，而这内容就是合理的现实。此处应该指明的是，所谓“合理的现实”，并非我们经常见到的某种现成的事物，或实际经历过的各种事件，而是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现实性仅仅属于那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因此，在必然性未被真正揭示和领会的地方，现实本身是不可能同我们照面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不在于后者要求作为内容的社会

现实的积极呈现，而恰恰在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最终依然从根本上遮蔽了社会现实本身。这种遮蔽并非出自特殊的观念，而是出自这一哲学的根本性质。因为绝对唯心主义必然把经验神秘化，而它之所以把经验神秘化，是因为现实最终被完全等同于理性（自我意识的理性与存在着的理性的和解）。这样一来，作为内容的社会现实本身就不得不被抽象的思想所扼杀，因为那种为绝对唯心主义所认可的本质，说到底乃是与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本质，因而真正说来乃是其“非现实的本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将黑格尔哲学的这种性质称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正是这种非批判性，使得社会现实本身再度隐遁起来。据此，马克思要求使真正客观的、现实的思想完全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上去：“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

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方面，以主观意识或主观思想为根据的立场首先表现在“西化派”的观点中。我们姑且不去谈论这派观点实际诉诸的种种要求（它们总是同我们历史实践的某一方面相联系并从中发生出来的，因而总是历史地具有其意义的），因为重要之点现在已取决于这种观点的哲学实质。当它们将现代世界本身抽象化为一般原则或无内容的形式时，它们也把构成这一世界的诸民族（包括其历史—文化）抽象化为无形式的内容，即单纯的质料，以便使外部反思能够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抽象的原则之中。如果说，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地从属于哲学上的主观思想，那么，与之相反的见解——我们想说的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复又如何呢？对于现代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2页。

而言，这一派的见解可以是批判的，但由于这种批判具有单纯倒退的定向，所以它又是浪漫主义的。然而，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适足以构成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反动，即其必然的补充，却不能真正克服后者；当它只是停顿滞留于后者的反面时，它便不得不从这反面落入主观意识的本质之中。一句话，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漫主义同样是以主观思想为根据的。上述二者构成了规定中国当今现实的两个基本的观念方面，但孤立地说来或者分离地说来，它们并不反映这个社会现实的总体，相反倒只是误解或曲解这个总体。于是，由之而来的观念在意识形态上便表现为彼此对立的极端，它们将现实的规定变成单纯抽象，并由这种对立的抽象来开展出本质上同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

面对如此思想格局，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只有扬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扬弃这种对立共同依循的主观意识本身，真正的社会现实才可能积极地显现出来并且从根本上被把握住。就此而言，我们不仅需要黑格尔这位教师，而且尤其需要马克思这位导师。因为他们把揭示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哲学任务和方法论要求提了出来，只是当黑格尔把这种内容转变为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理应成为我们应答中国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的主干或基础。

胡建的《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该著借助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中国现代化思想演化的依据：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本质上不取决于单纯的学理而取决于独特的国情。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进行着见仁见智的多种求索，其运演轨迹并非直线式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上升过程，而是在特殊的国情

中，在不同思想家的不同向度的努力中，呈现出曲折坎坷的“合力”趋势。此著力图扬弃以主观意识为根据的“反思哲学”的研究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探索过程有可能以其真实性来同我们照面。大体说来，此书稟有如下特色：

(1) 在研究方法上，此书采用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的研究方法诠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史。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采用，是因为历史本身具有“现实性”与“可能性”两种存在形式。在这里，历史的过去显现为“在多种可能性中实现的一种”的全景，而且，历史的价值更眷顾现在与未来，因为后者乃是正在发生与将要发生的历史。本书的研究方法揭示出，历史活动的意义是在“先前历史”的影响下，实现“后来历史”的筹划与追求。

(2) 在内容阐释上，此书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来揭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递嬗演变。中国近代的现代性价值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吸纳西方文化价值，它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取其所需；而西方式的现代性价值被中华民族引进后，也不是按其原来的轨道演化，却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价值。因此，所谓现代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不断被岔点间隔开，并一再为休止期和灾变期所打断的过程。它的构型是累积性、跳跃性和分叉性的，而非单纯线性和渐进性的。高峰、深谷、跃前、退后、盘曲、发散、畸形、特化、停滞、迁变等等，都是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情状。

(3) 在人文启迪上，此书试图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展开历史性实践，来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家在独特的问题领域中的思考努力，发掘出它们对我们今天的实践，甚至对人类发展所具有的文化启迪意义。因此在某种视角上，此书关注的不是纯粹过往的“历史”，而是历史中含纳的真理性价值。这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有实在的事实，

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己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

当然，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不同见解的争论之中，而这种争论不过是社会现实内在冲突的理论表现。此书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脚点，从中国社会的独特国情来探讨现代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得出对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有启迪意义的见解，可谓有新意之作。如果它能够给读者带来更深入的思考，作者的数年之劳就算没有白费了。

我愿将此书推荐给关心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读者们。

2007年8月16日

序 二

侯 才

现代性可谓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更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何谓“现代性”？据现有研究资料，现代性概念至早出现于十七世纪上叶，十九世纪才流行起来，二十世纪后期受到广泛的重视。又据哈贝马斯的考察，这一概念十八世纪在波德莱尔那里才获得全新的、现代的意义，而把现代性作为哲学问题来探讨则始于黑格尔。

对现代性的理解迄今仍歧义纷呈。哈贝马斯将其视为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福柯将其当作一种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思维模式，吉登斯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后传统秩序”，即后封建的工业化世界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实际上，应把现代性理解和界定为现代化过程的质的规定。通俗地说，就是现代何以成为现代的内在根据。它是现代化过程本身及其各种表象的本质。所以，尽管它与现代化过程有着同一性，但不应该把它等同于现代化过程本身，更不应该把它等同于现时代、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主义。

现代性的底蕴和核心要素是主体性原则。而主体性的精神规定性和价值规定性则分别是理性和自由。在近代即现代化初期，主体性主要通过理性得到彰显；在当代，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主体性则主

要通过自由得到昭示。

从这一视点来看对现代性的各种诠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均将现代性实体化了，而福柯则将现代性主观化了。

马克思没有就现代性的一般问题作出专门的阐述。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曾作过系统的、深刻的经济学分析。所以，应该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分析提升到现代性问题的高度来看待。它实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因此其中也内含了关于一般现代性的理解。

现代性蕴含了创造与毁灭、赢取与丧失、进步与退步等等的悖论，象征和表达了人类社会的深刻冲突、人性的内在矛盾以及人类生存实践的辩证本性。由于现代性含有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现代性的不同认识和追求，就形成了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等不同的理论和思潮。

在当代，现代性伴随全球化进程而愈益具有普适性，而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却变得更为深刻。这在当代西方哲学理论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韦伯把现代性看作经由理性化而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海德格尔把现代性主宰的时代称为人被远远抛弃的时代，丧失了基础而悬于深渊之上的时代，同时宣布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终结。福柯提出了“人之死”，从根基上宣判了现代性的宿命。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仍具有进步与贡献、压迫与破坏的双重性。这些看法之间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都肯定了现代性中蕴含着无可避免的危机。

现代性的危机何在？黑格尔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主体性原则不具备宗教那种绝对的统一的力量。海德格尔把这种危机的根源追溯到作为架构（Gestell）的技术或技术架构。韦伯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理性化”。伽达默尔认为，危机的根源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

秩序，更在于人类对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文明成果的依赖性。哈贝马斯把危机的根源视为个人自由的悖论（负效应），并诉诸直接起源于黑格尔哲学的主体间性以及由此建立的交往理性的作用。这诸种论说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触及问题的实质，但是却似乎并未道破问题的关键与核心。

从根源上说，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是主体性，所以，可以说，现代性的危机本质上是主体性的危机。然而，主体性危机何在？主体性危机又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主体自身缺失了主体，即人虽成为自然和万物的主体，但却未能让人自身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体。也可以说，主体性原则自身出现了主体的空场。这是一种主体之主体的缺位。

卢卡奇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深刻的洞见：任何一种人道主义或人类学立场的巨大危险在于，当它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尺度的同时，却不用同一种立场来衡量人，不把人这把尺度也应用于人自身。他的论述无疑击中了各种绝对的人本主义和主体主义的要害。当然，当卢卡奇这样言说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独断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卢卡奇的论述转用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的揭示。

找到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也就解答了所谓拯救现代性的谜底。这就是构建一种使人成为人自身之主体的主体性。不仅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万物的主人，而且使人也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成为自身的本质、需要和欲望的主人。

人类能否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体，成为自身的本质、需要和欲望的主人，这要看人们的当下和未来的实践，由实践来验证。《醒世恒言》中载有一条寓言，颇令人回味和警醒。文云：故事主人公薛伟于高烧昏迷中化为鲤鱼，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耐不住饵香扑鼻，张口咬之，终被钓去。作者点评曰：“眼

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由此观之，人类成为自身的本质、需要和欲望的主人之路似乎并不通畅和平坦。

胡建教授的《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专著。这是一部题目重大、视域独特、方法考究以及研究具有原创性的著作。

该书径直深入“价值认同体系”这一文化内核，从“现代性价值”的视角对近代中国思想史进行了重新研究和描述，实际上是一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史或现代性价值观的演变史。它揭示和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深层内蕴和主观逻辑。

在方法论方面，作者没有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这一方法上，而是明确提出和自觉诉诸“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这一“双重解读法”。由于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在本质上映现和体现在思想文本及其解读中，所以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就被合理地聚焦在文本的现实性（历史事实的记录）与可能性（文本的解读）的统一中。显然，作者所诉诸的这一方法具体体现了历史中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及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在逻辑上，作者勾画了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追寻现代性价值的历程——孕育、奠基、深化和转向——的四部曲，提供了近代中国现代性价值史演变的宏观线索。遵循这一主线，作者依据原典对二十多位近代著名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大力发掘、缜密梳理和深入研究，其中不乏亮点和真知灼见。

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重大的理论课题或许就是建构和确立合理的现代性价值。它规定和制约着道路的选择和制度的设计。我相信，在此方面胡建教授的这部著作能够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2007年8月10日于北京大有斋

序 言

本书旨在通过剖析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的脉络，“实事求是”地揭示：中国何以形成了今天的现代化格局，它的渊薮、特性与历史规律何在，它又将可能进一步演进至何方。贯穿于本书的最大启示（也是作者追思数年才感悟的真理）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本质上不取决于学理而取决于国情。尽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但这一规律必须纳入每个国家发展的“主观逻辑”才能发挥作用而成为现实。这就是说，尽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决定了历史运行的总趋势，但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它既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而成为独立实体，也不可能离开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相反，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为一定的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所导引、所伴随、所追随，这样，以经济必然性为底据的历史规律在现实中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交互作用的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国情中所形成的殊异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决定了它们实现普遍规律的途径必然是殊异的。因为人的实践是受文化思想规导的，而作为文化思想核心的价值认同系统乃人们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积淀的民族心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它被大多数人接受为“不言而喻”的东西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无形中调控着人们的实践模式，据此决定了民族发展的“自我合理性”的“主观逻辑”。在

这种视角下，任何民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都必须遵循自身的“主观逻辑”演化，外来文化价值只有纳入“主观逻辑”才能发生作用，而且只有当“主观逻辑”沿革为现代性价值——由市场经济发轫而来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公正等现代性精神时，才能完成实践模式的现代转型。

根据“总体性”思路，近代中国人是处在与西方不同国情的“主观逻辑”中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因此其追索现代性价值的心路呈现出独特轨迹。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沿循救国使命由“变器”→“变政”→“变教”→折向社会主义的合历史逻辑过程，而孕育、扩展以至最后定型现代化思想的。本书特别指出，在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追求的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近代启蒙所确定的价值认同系统。但由于该系统与中国的文化土壤水土不服而难以扎根与结果，于是先进知识分子又选择了与国情相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自然，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会成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格局中追求民族现代化的合规律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深入发展，不仅在历史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主观逻辑”，而且至今仍是我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全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中西启蒙思想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一般而言，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运动含有两大价值目标：其一，建构工业文明的人权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其二，建立具有现代主权意义的民族国家，现代性价值围绕这两大目标展开。而在中国现代性价值的萌发期（明末清初），由于尚未面临创设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因而现代性价值的发轫主要在人权价值。由于中国的国情迥异于西方，所以发轫于明末清初的中国启蒙价值观具有与西方现代性价值不同的

形式：(1) 在自由观上，中国明末的启蒙思想家视个性自由为“新道德境界”，要求人们转换传统伦理视角，肯认个性自由的合德性；(2) 在民主观上，即使最彻底的“民主”思想家黄宗羲，也只是在“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据上扬弃作为“君道”的民本思想，但尚未对君主专制制度作本根性否定；(3) 在平等观上，中国的启蒙“平等”观仅停留在道德境界的“人格平等”，并且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而推行之。

第二章，“‘变器’时期：现代性价值的孕育期”。由鸦片战争前后至洋务运动失败，可称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器物”的“变器”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化的两大目标均已提上历史议程，并成为全民族各阶层的“社会期待”。中国先进思想家承接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思致，开始了对这两大目标的思考，并在模糊的思理中孕育着中国式的现代性价值的雏形。这时期的主要思趣有：(1) 龚自珍作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认为，既然个性自由是合道德的，那么体制外的“自由”知识分子参政也完全是合理的，它体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时代需要；(2)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信仰与《天朝田亩制度》中蕴藉着农民阶级对现代“平等观”的朦胧愿景；(3) 洋务思潮代表统治阶级内部先进者对现代性价值的心路。它从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的“自强”目标发端，历经意欲取得实效的“求富”理路，最终发展为前瞻未来的“君民共治”取向。体现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理念对制度层面的期望；(4) 在建立主权国家的思考方面，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为手段，“制夷”为目的的思路。这是中华民族面临西方侵略提出的现代化对策。它与西方思想家所主张的利用民族国家的“长技”向外扩张的路向背道而驰。

第三章，“‘变政’时期：现代性价值的奠基时期”。以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变政”（改变政体）

时期。这一时期中的先进思想家群体力图使中西文化在社会各方面全面结合，为中国式的现代性价值奠定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先进思想家承受着西方启蒙思想家所未遇的艰难处境。在下层，民众并未认同现代性价值，因此先进思想家的“变政”主张没有社会基础；在上层，统治阶级的主流对企图削弱专制权力的思想家不遗余力地进行镇压，因此先进思想家是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来追求现代性价值的。这一时期的现代性价值呈分途并进的现象。一部分先进思想家认为，“主权中国”的创设应以“新民”人权的确立为前提，因为没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就不可能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这方面的主要理论有：（1）梁启超的“新民说”；（2）谭嗣同的“心力说”；（3）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学说；（4）章太炎的“个性说”。然而，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认为，“救国”之要求甚于“新民”，因而倡导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当下急务。这方面的主要理论有：（1）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政治创见和“大同”的社会远景说；（2）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第四章，“变教”时期：现代性价值的深入发展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变教”（改变“教统”——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系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一方面由于清朝专制权力的解体，给了先进知识分子争取现代化两大目标的极好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价值在民间的启蒙困难重重，导致“共和”政体的变形，使“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在建构新文化价值系统方面呈现出矛盾难解的困窘局面。这主要表现为：（1）陈独秀的“民主”与“科学”思理中充满自相矛盾，难以落至实践层面；（2）鲁迅的“立人”思想试图为“民主”奠定个性基础，但未能解决“立人”与“立国”的正确关系；（3）胡适运用“实验主义”解释“科学救国”的理性，但“实验主义”本身并不“科学”；（4）李大钊采借“文化调和论”

探索现代性价值的“第三种文明”，但其中含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悖论取向。

第五章，“现代性价值主流的转向：折入社会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证明了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思想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性价值走到了尽头。事实上，尽管这种学理合现代化潮流而得到某些发展，但因其在本根上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观逻辑”）不适应而屡遭挫折。在这种情势下，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选择了与国情有相当契合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新思想武器，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整合加工，才最终使之成为能够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两大目标的理论武器。然而，任何“起点”中都既包含着事物发展的潜势，也含纳矛盾展开的因子，中国式社会主义源头思想也不例外，更何况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们是沿循各自不同的心路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选择”的。这具体表现为：（1）陈独秀在“建党”前后所形成的“俄式”社会主义观，尽管是中国近代历史境遇的必然性产物，但同时含纳该模式所具有的缺陷；（2）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陈独秀的拾遗补缺，因此它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有殊多异趣，这异趣在质地上反映着对社会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见解；（3）瞿秋白的社会主义学理独具一格，它是在对东西文明俱失望后所选择的“第三种文明”；（4）青年毛泽东为求索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宇宙的“大本大源”而走向社会主义。总而言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主义实践思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但他们思想中坚执的“社会主义单一模式”的绝对真理式的见解，又潜隐着某些失误的因子。

第六章，“历史对当代的启迪意义（上）——国际篇”。近代中国人追求现代性价值的历程对我国今天的国际性实践具有三大文化启迪意义：其一，中国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追求现代化的，所以它不